

敌后抗战何以可能:以全民族抗战时期 太行抗日根据地党组织建设为中心的考察

王峰, 罗浩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在全民族抗战时期,为提高党领导敌后抗战的能力,太行抗日根据地党组织通过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建立科学严密的组织体系、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员队伍教育等方式,建立健全党的组织体系,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为党成功领导敌后抗战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全民族抗战时期太行抗日根据地加强党组织建设的实践证明,不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是党成功领导敌后抗战的宝贵经验,太行抗日根据地党组织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重视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为顺利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组织保障。

关键词:组织建设;党的建设;太行抗日根据地;敌后抗战;中流砥柱

中图分类号:K269.5;D2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5.06.001

文章编号:2096-9864(2025)06-0001-11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部任务要靠坚强的组织体系来实现,没有组织这一实体性建设,党的各方面建设就无从谈起,党的各项任务就无从实现。全民族抗战时期,太行抗日根据地是中共中央北方局与八路军总部的长期驻地,是组织和领导华北抗战的枢纽,影响着全民族抗战大局。为充分发挥太行抗日根据地在敌后抗战中的作用,太行抗日根据地按照党中央的要求,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通过健全完善党的组织体系、坚定党员队伍的理想信念、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使党领导敌后抗战的能力和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党在领导太行抗日根据地组织建设中积累

的宝贵经验,为我们党加强组织建设、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历史借鉴。关于如何认识敌后抗战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作用,以往学界不仅从持久战战略、反“扫荡”作战、军事力量发展、基层干部配备乃至地缘因素等方面展开研究,还通过对比国共双方在敌后战场的表现^[1-6],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战取得胜利的多种因素。人民群众是战争胜利最深厚的伟力,在敌后抗战中广大人民群众是如何被中国共产党组织动员起来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鉴于此,本文拟以太行抗日根据地党的组织建设为分析视角,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领导敌后抗战并取得胜利的问题,以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

收稿日期:2025-05-29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253200039)

作者简介:王峰(1981—),男,河南省襄城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共党史;罗浩(2003—),男,河南省邓州市人,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批驳“游而不击”的错误观点。

一、太行抗日根据地加强党组织建设的时代背景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随着华北地区国民党军队的败退,中国共产党成为敌后游击战争中政权与武装的主要领导者。然而,党组织的弱小、力量涣散等问题严重影响着根据地的建设,乃至全民族抗战路线的落实。因此,大力发展党员、健全地方党的领导机构,加强党在政权、武装和群众运动中的领导作用,成为党领导太行抗日根据地敌后抗战的必然要求。

1. 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内在要求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建立和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任务。建立一个坚强的组织,切实担负起领导全民族抗战的任务,成为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随着抗日斗争形势的不断变化,在领导抗战工作中,党的组织力量薄弱的问题日益突出。1937年11月,毛泽东明确指出:“必须清楚地懂得,党的组织力量,在全国,一般地说来还是微弱的。全国的群众力量也还是很薄弱,全国工农基本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这是我党在现时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最基本的弱点。不克服这个弱点,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7]394-395}在日军重点进攻的华北地区,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广大华北地区顿时陷入了无政府的混乱局面。在晋东北的广大区域中,“简直找不到行政负责人,社会秩序极端混乱,散兵流氓乘机作恶,汉奸到处欺骗造谣,人民情绪惶恐不安”^[8]。按照中共中央“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9]的基本路线和工作方针,华北地方党组织在八路军

密切配合下开始创建敌后根据地。在领导敌后抗战的过程中,党深刻地认识到,要坚持持久抗战,就必须建立起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离不开政权、军队和群众的支持。因此,为使党政军群更好协调一致,必须有一个坚强的党组织作为领导中枢,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的彭真指出:“要对日进行持久的抗战并彻底战胜日寇,要改革政治机构使它成为抗日民主廉洁的替民众办事的政府,要改造军队使它在抗日战争中有顽强持久的战斗力,要发动顽强持久的抗日和改善生活的群众运动,要使抗战能坚持到底不被亲日汉奸们断送,没有千千万万的党员和强固的党的组织之领导,是绝对没有保障的。”^{[10]76}太行抗日根据地既是“两个战场”(即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配合、相互呼应的支撑平台,又是“三种政权”(即中共根据地抗日政权、国民党政权、日伪政权)交互渗透、激烈争夺的主要场域,亦是“四方力量”(即国民党中央系、阎锡山地方系、中共、日伪)犬牙交错、彼此博弈的展演舞台^[11]。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敌后创建的核心战略区,太行抗日根据地之所以能够成为全民族抗战中坚持持久战的坚强堡垒,正是因为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不断推进组织体系建设、加强党员干部队伍教育,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力量,以正确的组织路线确保全民族抗战的政治路线得到贯彻落实。

2. 组织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亟待解决

组织建设本身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化、持续完善的过程。在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围剿”中,党组织存在着党员数量不足、干部本领缺乏、组织内部成份复杂、整顿组织的方式简单粗暴等问题,使党不能有效地开展对民众的组织动员和领导工作,给根据地的建设和对敌斗争带来了严峻挑战。

党员数量不足并且本领缺乏,是太行抗日根据地建立之初面临的突出问题。据时任冀豫晋省委书记的李雪峰回忆:“省委成立时直接依靠的党员仅30来人,加上原属平汉线省委的元氏、赞皇、磁县等县以及中条山、豫北的一些关系,党员有100多人。”^{[12]25}“这些习惯于在城市发动工人搞革命的党员,转到面向农村,面向农民,确实是一个战略上的大转变,思想上的大转变,工作方式上的大转变。”^{[12]27}这就导致了根据地建立之初党组织软弱无力的状况,出现了“只见八路军不见党”^{[10]14}的现象。为解决党的规模问题,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明确提出,“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的任务,强大的党的组织是必要的”“目前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13]186}。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太行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规模。然而,在党组织快速发展的同时,又出现了党员质量降低的问题。太行抗日根据地“大量地吸收,不注意成份来历,形成党内成份复杂。如赞皇吸收富农,成立富农支部与贫农支部对立;有的地方公开发展组织,形成大开门的现象”^{[10]508}。1939年8月,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的要求,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大部分地区停止发展党员,进行党组织的整顿和巩固工作。面对日军的“扫荡”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根据地的各项建设都必须进一步加强,然而整党工作被当作突击任务,出现了与党的中心工作相脱离的问题。1940年8月,时任冀豫晋区委组织部部长的徐子荣在总结工作时指出:“经过11月的公粮动员,12月的扩兵突击,1、2月的民主运动,以及以后的春耕运动与民生运动,我们一般工作是大大前进了,但是没有与这时期工作相符的组织建设,有轰烈的运

动而组织的收获不大,组织工作没有相应地提高。”^{[14]519}整顿本身并不是目的,整顿党的组织以更好地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才是目的,若是脱离党的中心工作而进行整党,其带来的结果就是偏离正确方向,造成党内的混乱。太行抗日根据地出现了在四天左右就完成了支部清洗的不正常现象,且“清洗掉的是好同志,留下的仅是欺骗蒙蔽的坏分子”^{[14]520}。这些问题充分说明,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是一个艰巨且长期的任务,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创新组织建设的方法、增强组织建设的效果,才能不断增强党的领导能力。

3. 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

铁的组织纪律和严密的组织系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党组织的强弱决定了党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是影响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的关键因素。在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复杂环境中,必须不断完善组织体系,强化政治领导,深入开展群众工作,这不仅是开展对敌斗争的现实需要,更是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

为使党更好地担负起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并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命题,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毛泽东指出,在抗战过程中,“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党的武装力量,也在同日寇的斗争中重新壮大起来和进一步坚强起来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更加扩大了”^{[7]612}。面对党内新老党员依旧存在的“不是布尔什维克化的”或需要“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问题,毛泽东提出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任务^{[7]603}。在如何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这一重要问题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党

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7]605} 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不仅是党夺取胜利的手段,更是锻造队伍、提升组织力、扩大群众基础的重要平台。太行抗日根据地是对敌斗争和反顽固派摩擦的前沿阵地,党的组织面临着复杂且严峻的斗争形势。在太行抗日根据地,随着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的普遍展开和抗日民主政权的陆续建立,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形成对日伪占领区的反包围。日本侵略者为恢复和确保占领区的治安,提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口号,采取一元化的“总力战”,展开对根据地的大规模进攻^[15]。此外,国民党顽固派以抗日民主政权为主要目标,不断挑起反共摩擦,遏制共产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处理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反顽固派摩擦的关系,处理好对敌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的关系,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就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将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

二、太行抗日根据地加强党组织建设的具体方式

太行抗日根据地地处华北战略要地,是日军南犯的重要通道,长期处于敌强我弱、斗争极其残酷的环境中。太行抗日根据地党组织通过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建立科学严密的组织体系、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加强党员队伍教育的方式,建立起坚强有力的党组织,凝聚起取得抗战胜利的最深厚力量。

1. 灵活运用统一战线

在全民族抗战时期,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党组织建设摆脱狭窄小圈子,进入发展新天地。

在 1935 年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严厉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确立

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会议决定派刘少奇到华北地区主持北方局工作,“其任务主要是加强对反日学生运动及游击战争的领导,大胆地运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巩固党的秘密组织,使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结合起来”^[16]。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下,党先后成立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和山西新军,它们名义上是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组织和部队,而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团体和抗日武装。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后,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与牺盟会紧密配合,迅速打开了党组织建设的新局面。例如,党挑选进步青年加入牺盟会特派员训练班,并将牺盟特派员发展成党员,然后派往各县,利用他们的合法身份积极协助推进党的组织建设^[17]。在通过牺盟会选拔积极分子并发展入党的同时,党也直接派党员参加牺盟会的工作,在这一合法形式的掩护下恢复与建立各县的党组织。冀豫晋省委建立后不久,时任中共山西省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的徐子荣“直接选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到各县公开担任牺盟会特派员,每个县的共产党员特派员赴任前,都由他代表省工委谈话,分配任务”^{[12]26}。共产党员被派往各县之后,其首要任务是发展牺盟会会员,但是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通常把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介绍给党组织。到 1938 年初,山西全省的 105 个县中,有 70 个县的县长由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干部充任,其中绝大多数为共产党员^[18]。除牺盟会这种形式外,在冀西,杨秀峰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指派以“国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保定行营民训处冀西民训特派员”的合法身份进行统战工作,为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极大便利^[19]。在豫北,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的朱瑞以十八集团军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联络处主任的身份在公开合法形式下开展了党的工作,发展了党的组织^{[20]9}。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太行抗日

根据地迅速建立起党的各级组织,这些组织成为联系群众、组织抗战的核心力量,对于推动全民族抗战的开展和党在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太行抗日根据地的腹地黎城县,党组织发展起来之前,全县抗日缺少主心骨,面对日军的攻势,“阎锡山委派的黎城县长田齐卿慌了手脚,便找了县里的一些地主士绅杨仲文、韩敏德、李魁芳、高菑三等人商议出路,最后决定日本人来了便投降”^{[20]644}。面对这种情况,八路军工作团与当地牺盟会紧密配合,在撤换旧县长的斗争中吸纳积极分子入党。随着党组织在黎城县的发展和健全,当地在党的领导下不仅组建起了地方抗日武装,而且充分地深入到农村,发动了广大群众。1938年4月,在日军的“九路围攻”期间,黎城县的党组织发挥了敌后抗战的主心骨作用,“县委一方面组织干部,深入农村,宣传抗日,组织成立农民抗日自卫队;另一方面利用阎锡山的‘有钱出钱,有粮出粮’的‘合理负担’办法,征收地、富粮食,以保证部队和抗日工作人员的粮食供应”^{[20]647},有力地支持了当地民众坚持长期抗战。在冀西,杨秀峰领导的冀西民训处成立之前,时局混乱,溃兵、土匪危害人民,难以形成有力的抗日力量。冀西民训处成立之后,吸纳了共产党员,组成工作团,进行广泛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在工作团普遍进行宣传和初步组织起来的基础上,各地分别采取召开村民代表会和士绅座谈会形式成立起冀西地区各县区人民自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府,统由民训处加委”^[21],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提振了人民群众抗战胜利的信心。

在党组织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太行抗日根据地能够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充分运用统一战线形式去开展党建工作,不仅使党的队伍不断扩大,党的力量迅速增强,而且提高了党运用统一战线的能力。在太行抗日根据地中,统一战线的运用实际上就是反对党内长期存在的

“左”倾关门主义,面对要不要大刀阔斧地发展党的组织力量、如何发展党的组织力量这一关键性问题,太行抗日根据地根据全民族抗战路线灵活运用统一战线打开了局面,使太行抗日根据地党的组织力量能够顺利落地生根。

2. 建立科学严密的组织体系

党的组织体系是生成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基础,没有严密的组织体系,也无从谈起党的领导力量。太行抗日根据地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组织形式,建立了一个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

关于党组织的设置,在1938年5月,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的邓小平基于太行抗日根据地面积日益扩大的现实情况,认为应该适当调整组织层级,变小特委为大特委,适当设置中心县委,赋予其更高的自主权。邓小平提出:“党省委现转区域很宽,如仍照过去小特委制度,其优点是特委区域小,易管理,其缺点是省委无法整理……特委太多,干部配备必弱;离开省委,各区领导必发生困难。”^[22]按照邓小平的建议,冀豫晋省委调整党的组织设置,将晋中特委与冀晋特委合并为一个特委,这样既能够充分发挥大特委的自主性,又能够使原本不同地区的党组织取长补短,从而更好促进组织的发展^{[10]244}。1938年11月,为进一步增强党的团结与统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规定“为了开辟附近地区党的组织,可设立临时的中心县委、中心区委及中心支部等”^{[13]774}。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1939年7月,晋冀豫区委对组织形式进一步作出了具体规定,要求“中心支部的组织,设正、副书记。副书记领导本村(主村)支部,书记领导各小村支部。为了使中心支部能与各小村支部密切一致,打破过去某些地方的主村与副村的对立,并使实际上纠正中心支部形成一级的现象,可吸收小村支部书记参加中心支部,为支干”^[23]。为了进一步改变基层党

支部组织形式混乱、成份复杂的现象,太行抗日根据地统一组织形式,改造党员成份,要求“支部干事会一般以三人至七人为宜”^{[14]812},并且要把支部的基础真正建立在贫农、雇农和工人的基础上。太行抗日根据地在党的组织设置问题上,一方面力求使中心组织的领导作用落到实处,另一方面又防止其成为独立层级从而阻碍上级到基层的指示传达,最终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严峻的斗争形势下得到有效贯彻执行。

借助于严密的组织体系,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得以在极为严峻的环境下坚持了下来。在斗争更为艰苦的游击区,许多基层党支部成为在反“扫荡”中领导群众武装保卫人民利益的核心。当地的党组织通过斗争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敌占区、接敌区的工作,“党在敌占区和接敌区建立荫蔽精干的地下组织,加强秘密工作,并使之和公开的斗争联系起来。使党的支部,在所有地区都成为坚持对敌斗争的堡垒”^[24]。作为太行抗日根据地对敌斗争的前沿阵地,昔西县是日军的重点“扫荡”对象,1941年一度因“扫荡”而导致县区村之间失去联系,党政军群机关也基本解体。为了摆脱困难,打开根据地建设的局面,昔西县在上级的领导下进一步健全了县委和县政府领导班子,充实了武委会、公安局等机构,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重整旗鼓,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经过多次战斗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把游击区扩展到敌占区。这些战斗的胜利鼓舞了军民的斗志,密切了军民关系,使民兵也能够活跃起来主动袭击敌人^{[20]613-615}。科学的组织设置能够提高组织的执行力与协调力,确保决策能够得到顺利传达与有效执行。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根据对敌斗争形势变化适时调整组织设置,严密组织体系,确保将中央的决策上传下达,不打折扣。

3. 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统一全党

意志、强化组织力。在太行抗日根据地,面对各类党政军民组织之间不协调的现象,党十分重视加强统一领导,以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鲜明导向推进组织建设工作。

冀豫晋省委作为太行抗日根据地初建时期最高层级的党组织,十分重视在组织上加强上级对下级的领导。1938年6月,在粉碎了敌人的“九路围攻”之后,太行抗日根据地基本站稳了脚跟,冀豫晋省委根据新形势和新任务,强调通过“建立按期报告工作、检查巡视工作及科学的调查登记与统计制度”^{[10]216}来检查各地对上级指示的落实情况,加强上级对下级的有效领导。时任冀豫晋省委书记的李雪峰在巡视过程中发现晋中地区存在着包括“统一战线没有深刻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左’倾关门主义已与工作以不少损害,一些同志对统一战线了解不够,有错误,政治及党的基本知识水平低下”“党与群众工作不够深入与不够巩固”^{[12]49}等问题。通过巡视,不仅发现了地方存在的问题,推动了地方工作的开展,而且增强了上级党组织的领导能力。巡视是加强党的政治领导的重要方式,但是地方党组织对于巡视意见并不是教条地照搬照做,而是在深入理解巡视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区实际予以贯彻执行。时任晋冀豫区委组织部部长的何英才就下级如何接受上级领导提出的指导意见,认为“各级组织应正确接受党的领导,深刻研究讨论党的文件,深入地传达下级。只有坚决执行党的决议,才能使工作得到成绩。纠正对上级文件不讨论,不研究,当公式看的严重现象”^{[10]519}。太行抗日根据地通过巡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密切了上下组织之间的关系,既能够使上级的指示得到贯彻落实,又能够使下级的真实情况得到充分反映,彰显出了强大的领导力和组织力。

面对日军开展的“治安强化运动”,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单纯的武装斗争不能适应根据地建设的需要,必须将

游击战争和群众的利益紧密结合。时任晋中地委书记的赖若愚指出:“游击战争既然要结合各个战线的斗争,那么就异常需要与各种工作有统一的领导——领导一元化。领导愈加统一(统一于党),才能更加发挥高度的灵活性,没有统一于党的领导,就不能与群众真正结成一體,不能与其他工作密切结合,形成总的对敌斗争的力量。”^{[25]89}1942年9月,针对一些抗日根据地存在的“统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齐,各自为政,军队尊重地方党、地方政权的精神不够,党政不分,政权中党员干部对于党的领导闹独立性”^[26]等党政军民关系不协调的现象,中共中央对党的领导和各组织间的关系进行了调整,强调党对政府、军队、民众团体的统一领导。太行抗日根据地按照党中央的要求,成立了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作为当地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工作。

太行抗日根据地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1942年日军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期间,太行抗日根据地围绕反对敌人抢粮这一中心任务,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有效协调各部武装力量紧密配合,展开了一系列有力行动。同时,通过反汉奸、反特务斗争以及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多方联动、协同作战,最终取得了显著成效^{[27]39}。面对日军的抢粮企图,太行抗日根据地四分区充分发挥地方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作用,有效组织实施反制行动。大多数干部有组织地深入基层,领导群众应对挑战;同时全民族动员各方力量,打破县、区、村行政边界,实行跨区互助——游击区协助敌占区抢运粮食,根据地支援游击区保障运输,展现出较强的组织力和执行力,最终胜利完成了护粮斗争任务^[28]。时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的邓小平指出:“敌人对我实行‘总力战’,我们对敌亦提出了‘一元化’的斗争。过去经验证明:一元化实行得好的地方,对敌斗争才有力

量……今后应根据中央对敌后根据地统一组织机构的决定,认真实行一元化,从组织上保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敌占区的领导与各种工作的密切结合。”^{[27]43}太行抗日根据地从建立之初,便高度重视思想与行动的高度统一,通过持续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将强大的组织力有效凝聚于党的领导之下,实现了领导力与组织力的同步增强,从而使党在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各项建设中,充分发挥了坚强核心的领导作用。

4. 加强对党员队伍的教育

思想建党是党的建设的鲜明特色和突出优势,目的在于保持党的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太行抗日根据地党组织通过加强理论与实践教育,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落实。

党校是开展党员教育的主阵地,太行抗日根据地充分发挥党校的作用,通过建立“干部轮流到党校,党员人人住党校”^{[20]15}轮训制度,有效强化了党员干部的思想建设和根据地的组织基础。1938年6月,在党员数量和党的组织迅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冀豫晋省委提出,“以县或区为单位,经常开办新党员训练班,每个新党员最低必须经过党的建设或党员的基本知识、群众工作及游击战术的短期训练;老党员亦须经过短期训练班及流动训练班重新教育他们”^{[10]215}。在太行抗日根据地,不仅省委坚持开办党校,地委和县委两级党校也实现了常态化办学,形成了覆盖各级党员干部的教育体系。省委党校主要负责培训县级以上干部,县委党校则侧重对新党员进行系统培训。在教学内容上,针对地方干部,重点讲授党的政策和党对政权的领导方法;面向新党员,则侧重讲解党的组织纪律和合格党员标准等基础知识。通过这一完备的党校系统和分层分类的教学安排,从基层党员到领导干部均能获得有针对性的教育和训练。

随着根据地建设的不断深入,在村选运动、春耕生产等实际工作中,暴露出部分党员干部能力不足的问题。为此,党校及时调整和扩充教学内容,增加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专题培训,有效提升了党员干部应对实际工作的能力。例如,关于政策教育,即注意联系各时期的具体工作进行各种具体政策教育。如春耕时深入土地政策,村选时深入民主“三三制”政策,屯粮中财政政策等^[29]。1942年,在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期间,反“扫荡”形势日益严峻,晋冀豫区党委要求进一步加强支部内的战争教育,“认识敌我斗争形势(根据地游击性),与敌对根据地清剿破坏的新办法,支部党员如何对付敌人突然进攻清剿,如何根据新的形势保护群众”^{[20]234}。战争教育的内容既包括如何认识战争形势以巩固胜利信心,也包括如何正确利用群众武装以配合战斗。

太行抗日根据地通过加强对党员队伍的教育,有效提升了党领导敌后抗战的各项能力,党员在受教育后,不仅深化了依靠群众的观念,更掌握了发动群众的基本方法。例如,在与辽县桐峪镇的大地主韩炳峰家族斗争的过程中,八路军查实,其家族中有人投靠日寇沦为汉奸,因此决定没收其财产并分配给长期受剥削的群众;起初,群众心存顾虑,不敢接收财产;后来,在党员干部的带领下,据理力争、耐心动员,最终顺利完成财产分配工作^{[20]17}。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只有不断培养党员干部引导群众的能力,才能够应对复杂多变的斗争形势,确保根据地建设工作的有效开展。经过培养教育的党员干部,能够充分发挥生产带头作用,并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在晋中区,党员干部切实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涌现出李马保、王拴柱等一批劳动模范,他们既能够带头参加生产,又善于运用群众语言进行宣传动员,深入群众宣传“组织起来才能创造新社会”等革命道理。在实践中,他

们不断创新群众工作方法,总结出“摸透群众心思”“少说多做”等一系列务实有效的工作方法,注重结合群众的切身经验和实际需求开展思想工作,增强了说服力和感染力,进一步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25]135}。党的组织是由众多党员干部构成的严密整体,党的工作归根到底要靠党员干部通过各级党组织团结带领人民群众,朝着共同目标奋进。太行抗日根据地始终坚持对党员队伍的理论与实践教育,确保党员干部能够切实承担起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根据地建设的责任,充分体现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历史自觉。

三、太行抗日根据地加强党组织建设的历史经验

在全民族抗战背景下,太行抗日根据地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不断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华北抗战的坚强阵地。深刻总结太行抗日根据地党组织建设的历史经验,把握党组织建设的基本规律,有助于我们以更加坚定的历史自信和政治自觉加强自身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1. 组织路线要始终服务于政治路线

政治路线是党在一定历史时期为实现政治目标而制定的基本路线和战略方针,具有总揽全局的作用,决定着组织路线的方向。组织路线若是脱离了政治路线,就会影响到党的政治目标的实现。1937年8月,洛川会议制定了党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决定把实行全民族抗战与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把反对外敌入侵与推进社会进步统一起来,正确处理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30]。太行抗日根据地始终围绕着坚持全民族抗战的政治路线开展党的组织建设。在太原失守和国民党华北

正面作战结束后,党以华北地区最大政党的身份充分利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与牺盟会等地方统一战线组织密切合作,打破“关门主义”,迅速实现了党员数量的大发展。借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在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影响大大提高。全区党员由抗日根据地初创时的1000余人增加到1938年6月时的1万余人,其中晋冀特委有党员7000多人,冀豫特委有党员约1000人,晋东南特委有党员800多人,晋豫特委有党员约800人,新组建的太岳特委有党员500余人^{[31]88}。在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指引下,太行抗日根据地党的组织和党的队伍得到迅速发展,党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1939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提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党的组织,而巩固党的中心一环是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党的教育^[32]。根据中央要求,太行抗日根据地制定了详细的整党计划,一方面突出党员干部选拔的政治标准,另一方面加强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提高党员干部贯彻政治路线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在整顿支部的过程中,太行抗日根据地提出“在改造支部中,必须把支部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忠实可靠的经过实际工作考验的干部手里,并且要把支部的基础真正建立在贫农、雇农与工人的基础上,同时要尽量吸收农村中贫苦的革命的知识分子”^{[31]110},通过调整领导成份使基层党支部真正成为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坚强堡垒和连接人民群众的坚实桥梁。政治路线赋予组织路线以生命,组织路线为实现政治路线提供力量。太行抗日根据地党的组织建设始终服从和服务于党的全民族抗战政治路线,发挥了组织的真正功能。

2. 组织建设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

目标导向强调以目标的明确性与长远性来

指引当前工作,问题导向强调从现实矛盾和实际困难出发,以认识 and 解决问题为出发点。在组织体系中,党员、各级组织和干部是最基本的资源,是组织存在的物态化要素,社会和人民评判一个政党,感官上的认知首先从其实体性资源的各种要素开始^[33]。组织建设的好坏更具有直观性,影响着人民对党的认知和评判,因此需要在坚持目标导向的同时不断解决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太行抗日根据地在组织设置方面能够抓住关键问题所在,及时调整组织形式。对于在地方特委、县委、支部建立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能够及时解决,通过调整区划、变小特委为大特委的方式使不同地区党组织能够相互促进。此外,太行抗日根据地充分利用了中心组织等形式以先发展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便利了根据地的开辟与建设工作。在各地组织普遍建立起来之后,中心组织存在的必要性降低,部分中心党组织成为贯彻党的路线政策的障碍,因此太行抗日根据地适时地取消了中心组织这一形式。为了更好推动全区工作的开展,太行抗日根据地在取消中心组织的同时还探索了模范县和实验县制度,要求辽县在粮食、民主、民生、武装、生产、群众团体建设和党的建设七个方面做出成绩,形成经验,加以推广^{[10]106}。在1940年的整党运动中,太行抗日根据地始终坚持整党是为了建党,避免关门整党,将长期的组织建设目标与党面临的中心任务紧密结合起来;面对日军的“扫荡”,党组织学会了管理武装领导战争,发动群众参加人民武装,灵活运用多种斗争手段。在严重的灾荒中,党组织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实行精兵简政、节约粮食和各种物资,并以身作则参与生产劳动。党员干部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力量,为巩固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奠定了组织基础。由于坚持了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的统一,太行抗日根据地党的组织既能够贯彻

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又能够从自身实际出发,在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高组织的水平。

3. 组织建设的关键是党员干部队伍建设

党员干部队伍的形象是组织面貌的直接呈现,影响着人民群众对党组织的认同感和信赖感。只有把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好,组织才能有生命力。“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7]526},党之所以能够在太行地区开辟出抗日根据地并长期坚持下来,靠的就是具有根据地建设各方面知识的党员干部。党员干部的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长期的理论与实践锻炼中获得的。1939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对入党资格、党员成份、党员标准等党员队伍建设的基本问题作了系统阐述,提出了共产党员的六项标准,即“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群众模范”“学习”,“只有具备以上的六个条件,才不愧称为一个良好的共产党员”^[34]。这六条标准在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根据地创建初期,时任冀豫晋省委书记的李雪峰缺少在农村创建根据地的经验,于是就根据地创建问题请教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的邓小平。在邓小平的建议下,李雪峰“对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特别是明确了无论是在敌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还是开辟创建根据地,都要把抗日放在第一位,尽最大努力发动、组织一切力量参加到抗日斗争中”^{[12]32-33}。随着党逐渐在太行抗日根据地站稳脚跟,省委也开始独立开办党校,培养本地干部。太行抗日根据地对党员干部的教育不仅制度完备,而且内容充实,经过教育的党员干部的理论与实践素养均得到明显提高。除对党员干部进行教育外,太行抗日根据地十分重

视保护党员干部,在改造领导成份的同时对党员干部的审查采取了慎重的态度,科学划分阶级成份,强调把家庭出身与个人成份区分开来,避免一般地洗刷^{[20]187}。“太行根据地的干部群体在不断建设、整顿和改造过程中,并未活力衰减,而是越来越紧密地融入整个党的组织机体中,成为党的机体的一分子。”^[35]作为组织建设的具体执行者,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党员干部队伍带头践行政治路线,推动抗战大局,充分彰显了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在组织建设中的关键作用。

四、结语

作为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的关键环节,组织建设不仅是开展政治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的重要基础,更是提升党的领导、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根本保障。太行抗日根据地为了切实承担起带领人民群众开展全民族抗战的政治任务,及时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符合实际的组织建设方针和措施,推动党的组织体系不断健全,组织覆盖更加广泛,党员干部队伍素质持续提升,在组织规模和组织质量两个方面实现了同步发展,极大增强了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太行抗日根据地党组织建设的历史实践证明,党以自身组织建设领导敌后抗战的使命担当,不仅有效发挥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而且为党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宝贵经验。

参考文献:

- [1] 李雷波. 立足敌后:抗日战争与中共军事力量的成长[J]. 抗日战争研究,2021(3):19-25.
- [2] 程森. 战争、地貌改造与社会动员:华北平原抗日根据地军民挖道沟运动研究[J]. 近代史研究,2021(6):16-30,160.
- [3] 林娜娜,车麟. 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地缘战略分析[J]. 学术探索,2022(12):122-129.
- [4] 臧运祜. 抗战严重困难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事

- 建设[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59(4): 150-160.
- [5] 王士花. 全国抗战时期中共山东敌后武工队研究[J]. 军事历史研究, 2022, 36(3): 1-12.
- [6] 赵秀宁. 何以持久: 国民党青岛保安部队及其敌后抗战[J]. 军事历史研究, 2023, 37(2): 72-82.
- [7]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8] 聂荣臻. 聂荣臻回忆录: 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295.
- [9] 中共中央党史文献研究院.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 1937年卷[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4: 192.
- [10] 山西省档案馆. 太行党史资料汇编: 第1卷[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
- [11] 黄道炫, 岳谦厚, 黄正林. 纵论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及意义[J]. 军事历史, 2017(3): 1-10.
- [12] 李雪峰. 李雪峰回忆录(上): 太行十年[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15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423.
- [14] 山西省档案馆. 太行党史资料汇编: 第3卷[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 [15] 山西省档案馆. 太行党史资料汇编: 第5卷[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0: 747.
- [1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1卷(1921—1949): 上册[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423.
- [17] 辛军石. 抗日战争中的牺盟会和山西新军[N]. 人民日报, 1985-09-16(05).
- [18] 薄一波. 七十年奋斗与思考: 战争岁月(上)[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 254.
- [19] 杨秀峰. 杨秀峰文存[M]. 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7: 4.
- [20]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二: 党的建设[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
- [21] 赵德尊. 赵德尊回忆录[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40.
- [22] 邓小平. 邓小平文集(1925—1949): 上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86.
- [23] 山西省档案馆. 太行党史资料汇编: 第2卷[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 412.
- [24] 齐武. 晋冀鲁豫边区史[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 228.
- [25]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 赖若愚纪念文集: 上[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2.
-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19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422.
- [27]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 [28] 山西省档案馆. 太行党史资料汇编: 第6卷[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0: 92.
- [29] 山西省档案馆. 太行党史资料汇编: 第4卷[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841.
- [3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1卷(1921—1949): 下册[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477.
- [31] 张明楚.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史[M]. 修订本.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7.
- [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16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580.
- [33] 齐卫平. 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百年历史实践纵论[J]. 行政论坛, 2021(2): 19-27.
- [34] 陈云. 陈云文选: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44.
- [35] 赵诺. 太行山上: 中国共产党太行根据地干部政治成长史[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23: 536.

[责任编辑: 刘凤霞]



引用格式: 王峰, 罗浩. 敌后抗战何以可能: 以全民族抗战时期太行抗日根据地党组织建设为中心的考察[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6(6): 01-11.